

诗赋研究丛书

• 赵达夫主编 •

杜诗学与杜诗文献

郝润华等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诗赋研究丛书
赵逵夫 主编

杜诗学与杜诗文献

郝润华等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诗学与杜诗文献/郝润华等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 6

(诗赋研究丛书)

ISBN 978-7-80752-595-0

I. ①杜… II. ①郝… III. ①杜诗—文学研究
IV. ①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9436 号

杜诗学与杜诗文献

郝润华等 著

DUSHIXUE YU DUSHIWENXIAN

责任编辑 王 雷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0. 875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595-0

定 价 24.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诗赋研究丛书》序

赵逵夫

文学领域中，什么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质？诗赋。人们常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语言的艺术。尽管世界各个国家文学的百花园中都有诗，但是，中国的诗歌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是独特的汉语艺术。

汉语最大的特征，就是单音节，无词尾变化。古汉语则一字一音，一音一义，无附加成分。双音词一般由单音词组合而成，伸缩分合甚便。汉语又是以汉字为记录符号的。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结构特征，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书面语交际中误解的机会，又在表情达意和读音上有一定的提示、暗示性。所以，所谓“文言”，其词语的组合搭配，词序的变化，用词中的借代等，都十分灵活，在体现语意的轻重缓急和此轻彼重、此重彼轻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等方面，不必加附属句即可通过词语句法的变化含蓄地表现出来。抒情言志，通幽达隐，以

有限的文字表无穷的含义，实非其他语言文字可以比拟。

又由于方块汉字一字一音的特征，中国诗歌在语言布置方面可以做到形式上的完全整齐同节奏音律上的错综变化的统一；对仗、骈俪的艺术美也因而形成。

诗在本质上是抒情的，小说在本质上是叙事的。中国传统的诗歌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而长于抒情。黑格尔在其《美学》的《抒情诗》一节中说：

在对东方抒情诗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个别民族之中，首先应该提到中国人，其次是印度人，第三是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①

尽管黑格尔对中国的诗了解不是太多，但也道出了个中真理。

中国诗歌抒情特征的形成，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②，但同汉语汉字的特征应不无关系。

但是，诗毕竟是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学式样。真正由汉语汉字的独特性而形成的我国特有的文学式样，是赋。骈文亦以骈辞俪句为特征，但骈文中有些不属于文学的范畴，故这里只说赋。

所以说，在文学的领域中最能体现我中文化之特质的，是

^①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1页。

^② 黑格尔认为，哪个民族的诗较发达和成熟，应同该民族的特性、时代观和世界观有关。他说：“在这些民族特性、时代观感和世界观之中又有某一些比另一些更适宜于诗，例如东方的意识方式比起西方的（希腊的是例外）就较适宜于诗。在东方，未经分裂就是最真纯的，尽管它还不具有理想的自由。”见同上，第27页。

诗赋。

自《诗经》最早地集结了我们民族抒发喜怒哀乐的歌唱和反映当时政治礼仪、社会风俗的诗篇之后，屈原融合南北文学，写出了千古绝唱《离骚》，从而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此后贾、枚先后承风，开汉赋先河；马、扬以巨丽为美，润色鸿业；班、张赋京都，赵、蔡疾世邪，摹物抒情，俱有佳构。及至六朝，则诗人迭起，赋家如云。到唐朝，则无论诗，无论赋，都是美不胜收，如初唐四杰，李、杜、韩、柳，及樊川、玉溪，岂止是诗坛神笔，实亦赋苑圣手。宋代以后，诗、词、曲、赋俱有发展变化，其切今轹古者，代不乏人。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为我国民族精神的确立时期，而《风》、《骚》辉映，也奠定了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汉唐盛世，一以赋睥睨八荒，一以诗雄视百代。则《风》、《骚》、诗、赋，不仅是中国文学文化的宝藏，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和中华民族统一团结的纽带。

为此，我们在文学的领域中选择了诗赋，决定编辑出版一套《诗赋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中既有老一辈学者几十年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有中青年学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所作的可贵探索；既有研究专著，也有对作品的整理、诠释和评注。后者主要是想在目前被忽略了的方面做些工作。当然，某些热门课题中，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将提出来与学术界朋友们共商。

希望得到学术界朋友的支持与批评指正。

1993年5月于西北师大中文系

前 言

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他生平创作了一千四百多首诗^①，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在诗歌内容、形式及艺术性方面都堪称集大成之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杜甫伟大的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后世文人敬仰学习的榜样。于是，自五代以后，特别是宋人奉杜甫为“诗圣”后，历朝历代诗人无不以杜诗为圭臬，在创作中学习杜诗、模拟杜诗，故元好问称“少陵自有连城璧”，闻一多则称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②，并由此产生了“杜诗学”这个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不仅誉杜诗为“诗史”，而且开创了“千家注杜”的盛况，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国古代因之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杜诗文献。其中，对杜诗文献的编辑校注整理作为“杜诗学”的组成部分，自宋代以来形成风气，经久不衰，至清

① 这只是现存数量，还不包括已散佚的作品。据莫砺锋先生推算，杜甫生平创作诗歌约 3330 首，见《杜甫诗歌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闻一多《唐诗杂论·杜甫》，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5 页。

代达到高潮。据周采泉《杜集书录》统计，仅宋、元、明、清四代“全集校勘笺注类”文献即有82种，“选本律注类”文献有119种，这些文献构成了古代杜诗文献的重要内容。因此，今人有必要对这些杜诗文献做出进一步系统、深入的梳理探讨。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成果也很丰富，但古代杜诗文献堪称浩博，还有许多内容与领域有待研究开拓。因此，我们撰写了这部能成系统的《杜诗学与杜诗文献》，以点带面，集中对唐以后历代产生的重要杜诗文献进行个案式的总结和探究，以期对当前国内的杜诗研究有所推进。

本书由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对杜诗传承与杜诗学的总结性探讨，包括杜诗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明代李梦阳对杜诗的模拟以及晚清诗人鲁一同对杜诗的接受三方面内容，通过对杜诗承先启后意义的探究，进一步挖掘出杜诗学的深刻内涵。

第二部分是对宋代杜诗学文献的研究，包括对伪王洙注杜诗、赵次公《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以及黄希、黄鹤父子《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等几部宋代杜诗注本的探讨，基本涵盖了宋代产生的重要杜诗学文献。

第三部分是对元明时期杜诗学文献的研究，包括对高崇兰、刘辰翁《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及颜廷榘《杜律意笺》两部杜诗文献的研究。

第四部分是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的研究，主要以钱谦益《钱注杜诗》为主，包括对钱谦益注杜态度及原因的探讨，对钱注诗史互证及诗歌阐释方法的研究，以及钱笺与经学诠释学关系

的研究等几个方面。

第五部分也是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的研究，包括对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黄生《杜诗说》两部杜诗注本的探讨，主要考察这两部杜诗学文献对《钱注杜诗》的继承问题以及与清代前期学术的关系问题。

这些研究都是在大量搜集分析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都是持之有故，有感而发，如指出赵次公注杜对杜诗诗意的阐释、《九家集注杜诗》与《黄氏补注杜诗》的文献学价值、《钱注杜诗》与经学诠释学的关系、黄生对《钱注杜诗》方法的学习与吸收等。有些内容甚至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如对颜廷榘《杜律意笺》、高崇兰《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等文献的关注，以及对明代李梦阳、清代鲁一同学习与模拟杜诗创作情形的探讨，即是学术界首次对该领域与问题的研究，希望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进而推进国内杜诗学研究向前发展。有些部分则是笔者已经发表过的有关杜诗学与杜诗文献的研究论文，这次又稍事修订、增补。除笔者之外，本书其他作者均是笔者指导过的古典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书中相关内容大部分是在他们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算是我们为杜诗学研究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本书撰写人员名单如下：

第一章：郝润华、杜伟强、李如冰；

第二章：武国权、罗效智、房新宁；

第三章：邱旭、王燕飞；

第四章：郝润华；

第五章：郝润华、王永环。

目 录

《诗赋研究丛书》序	赵逵夫(1)
前 言	(1)
第一章 杜诗学与杜诗的承先启后意义	(1)
一 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	(2)
二 李梦阳对杜甫七言律诗的追摹与创获	(15)
三 晚清诗人鲁一同对杜诗的接受与超越	(31)
第二章 宋代杜诗学文献研究	(51)
一 杜诗伪王注误注析类	(60)
二 赵次公杜诗解释重视艺术性的特点	(75)
三 《九家集注杜诗》的特点及文献学价值	(88)
四 《九家集注杜诗》所收注家考略	(100)
五 《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的 特点及其价值	(127)
第三章 元明杜诗学文献研究	(154)
一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及其主要版本	(161)

二	从《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	
	看刘辰翁的评杜特色	(175)
三	颜廷榘及其《杜律意笺》	(190)
第四章	清代杜诗学文献研究(上)	
	——以《钱注杜诗》为例	(209)
一	钱牧斋注杜诗的动机与目的	(212)
二	《钱注杜诗》中的诗史互证	(231)
三	《钱注杜诗》及其诗歌阐释方法	(253)
四	《钱注杜诗》与经学诠释学	(277)
第五章	清代杜诗学文献研究(下)	(292)
一	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略论	(297)
二	黄生《杜诗说》与清初杜诗诠释方法	(311)
	主要参考文献	(329)
	后记	(335)

第一章 杜诗学与杜诗的承先启后意义

今人关于杜诗学的研究成果较多，论著如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廖仲安《杜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并见于《国学通览》，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林继中《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4期）、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孙微《清代杜诗学史》（齐鲁书社2004年版）等，总结历代杜诗学成就，探讨杜诗学理论，对推进“杜诗学”学科的建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令人关注；杜诗研究论文更是与日俱增、层出不穷^①，使杜诗学几乎成为显学。本章在此论述

^① 可参看林继中《百年杜甫研究回眸》（《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杜晓勤《二十世纪杜甫研究概述》以及逐年出版的《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一年研究综述”之“杜甫研究”栏目。

的问题并非鸿篇高论，只是就杜诗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试做一些探微发覆，试图对杜诗学研究的细化、深化做一些具体工作。

一 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

司马迁著《史记》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不仅对后世史家著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诗人创作也有所启迪，比如杜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范例。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不仅仅因为它善陈史事，还因为它能“书法不隐”，直言批判唐代最高统治者。这固然与时代环境、杜甫忠君爱国之心以及对《诗经》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等有关，但更是杜甫在思想层面上自觉接受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结果。

《史记》对中国古代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诸文体的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有学者注意到，它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比如杜甫诗歌就有吸收和继承《史记》的地方^①。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古代文体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破体”的问题，比如“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杜诗创作对《史记》的接受与继承，就属于“以文为诗”的范畴。然而，学者们在讨论《史记》对杜诗影响作用的时候，大多是从句法、章法、题材等文学表现手法或叙事结构方面入手，具体说是从史传文学作品角度探讨其对杜诗

^① 王友怀《谈“杜甫似司马迁”——兼谈史迁良史“识”、“德”修养里的诗家情质》，载《人文杂志》1994年第2期。

在文学层面的影响，却很少论及思想精神层面的问题。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就杜诗对《史记》在精神实质方面的继承关系试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杜甫“诗史”意义的具体表现

古人向以杜诗善写时事而尊其为“诗史”，如唐末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说：“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①宋陈岩肖也说：“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②杜甫的确善于在诗歌中描写时事，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进入了政治、军事、社会严重危机的多事之秋，朝政衰微，社会动乱，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杜甫的强烈关注，从此，杜诗往往以当前重大事件作为其创作题材，诸如描写征伐少数民族战争的《兵车行》等，叙述平叛战争的《悲陈陶》、《悲青坂》等，反映安史之乱的《哀江头》、《三吏》、《三别》等，即便是在一些抒情性很强的作品中对于时事都有如实的描写。特别是他用律诗、绝句尤其是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反映时事政治，并发表政治见解，是他以前的诗人所没有尝试过的，七律如《诸将五首》、《秋兴八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七绝如《三绝句》、《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等，这些诗开辟了全新的题材领域。因此，杜诗既是安史之乱前后那个动荡时代的画卷，又是一位饱经战

^① 孟棨《本事诗》，载《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本。

乱而忧国忧民诗人的心声。

然而，唐宋人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笔者以为杜诗“诗史”的更深意蕴则是体现在杜甫的“史笔”与“卓识”方面。就是说杜诗不仅善陈时事，而且还将直笔的方式对当权者及朝廷进行讥喻和讽刺，如《哀江头》、《丽人行》等诗讽刺杨国忠、杨贵妃兄妹，《洗兵马》、《杜鹃行》等诗揭露唐玄宗与肃宗父子关系，《留花门》批评肃宗借兵于回纥造成关辅危机，《忆昔》、《有感》等讽刺代宗的腐朽昏庸，等等。这即是对史家所说的《春秋》笔法的继承。清石间居士评杜甫《有感五首》说：“合上下两截观之，总是据事直书，不着一字褒贬，而褒贬之义自见。此公以《春秋》之笔，形之于律诗之间。”^① 不止是律诗，杜诗其他诗体也一样有以《春秋》大义褒贬时事、批判当权者的内容。所以，清人吴瞻泰《评杜诗略例》说：“‘诗史’二字，非徒谓其笔之严正如《春秋》书法也，如《北征》、《留花门》、前后《出塞》、《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洗兵马》、《冬狩行》、《收京》、《有感》、《洞房》、《秋兴》、《诸将》等诗，能括全史所不逮，足使唐之君臣闻之不寒而栗，谓非史乎？”^② 正是这一点使得杜诗的“诗史”意蕴更加深刻。那么，杜诗为何要以这种直笔精神体现其“诗史”意义的更高境界呢？

（二）司马迁《史记》的实录精神影响了杜甫

杜甫的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个皇帝的统治，他不幸赶上了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玄宗即位后，曾经产生了

^① 石间居士评点《藏云山房杜律详解》五律卷三，清道光刻本。

^② 吴瞻泰《杜诗提要》卷首，台湾大通书局《杜诗丛刊》本。

唐朝历史上最繁盛的所谓“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经济发达，政治清明，文化繁荣，思想开放，就连杜甫也在《忆昔》诗中盛赞这一段值得留恋的时光：“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然而，由于统治阶级的日益骄奢淫逸，朝政的日趋黑暗，朝廷征伐战争的频繁，终于发生了使唐帝国濒临覆亡的安史叛乱。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四十三岁，他深刻地体验了这场灾难发生的全过程以及肃、代时期的国家衰微形势，杜甫也因之生活得极为辛苦和艰难。“优秀的诗人都能是时代的晴雨表，而在社会急剧变动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大诗人，更能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脉搏。不管他们对行将消逝的旧事物是哀悼还是诅咒，也不管他们对行将出现的新事物是欢迎还是拒斥，他们的内心都会因时代的疾风暴雨而引起巨大的波澜，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激昂慷慨、哀伤愤怨，忧来无端，长歌当哭。在杜甫之前，有行吟泽畔的屈原，在杜甫之后，有悲歌‘万马齐喑’的龚自珍，他们都是时代所造就的伟大诗人。”^①因此，杜甫才能够创作出关注现实社会、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写实主义作品。

宋人认为杜甫“一饭未尝忘君”，由此推演杜甫的忠君思想，这是对杜甫诗歌与思想的穿凿和曲解。虽然杜甫具有强烈的忠君意识，但这种意识“是与爱国、爱民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时甚至是二位一体”^②。他“忠君”是希望通过贤明的

① 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8页。

② 同上，第288页。

君主以施行仁政，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以，他直接讽刺批判当权者。这种批判其实是善意的批判，是与杜甫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交织在一起的，也是其爱国思想的真正体现。

杜甫之所以能用史笔讽喻批判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除了以上所论及的时代环境与爱国情怀之外，当然还有其对《诗经》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与发扬。此外，笔者以为与他自觉接受《史记》的实录精神实质有着紧密的关系。

《孟子·滕文公下》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隋书·经籍志·春秋类序》发挥此说：“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婉而成章”是褒，“直书其事”是贬，他们的标准又是什么？《左传·成公十四年》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微者，委婉而不明言也，显者，直书不隐而彰也；志者，纪录事实也，晦者，暗刺以影射也。即是说用委婉的笔调讽刺时事，惩恶劝善，目的是为垂世立教，这就是《春秋》中所指陈的微言大义，这种“微而显，志而晦”的笔法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史学方法，被司马迁继承下来，在《史记》中发扬光大。

司马迁生活在国家大一统的汉武帝时代，由于文景之治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资源，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强大，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学术文化活跃：“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① 然而，到了后期，由

^①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97年版。